

依附下的成長？ 台灣傳播研究典範的更迭興替^{* **}

林麗雲^{***}

《摘要》

就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說，知識的生產深受歷史情境的影響。有鑑於此，本文分析：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情境下，傳播研究的成形與轉型。本文首先討論傳播研究史的主要途徑。在這個討論的基礎上，本文提出適當的分析架構。它指出：在「依附型成長」的政經結構下，台灣傳播研究大體隨著美國主流典範的迴轉而旋轉；但是，社群成員也會根據本地的需要與問題，加以轉譯。因此，在歷史的動態過程中，當國內外社會情境有變動時，台灣傳播研究典範可能轉移。根據此分析，本文最後討論未來的出路與前景。

關鍵詞：傳播研究史、典範、學術史、知識社會學

* 本文探討整體的傳播研究社群與典範，而不是個別的研究者或研究；本文所列舉的少數研究者與研究，只是用來說明某個時期社群與典範的特質；限於篇幅，這篇短短的論文，不可能逐一系列所有的研究人員與作品。掛一漏萬，遺珠之憾，是必然的。

** 本文是國科會計劃「台灣傳播學回顧與展望」(NSC89-2420-H-004-008-)的一部份，感謝主持人翁秀琪教授的支持與鼓勵。本文之初稿曾在「二十一世紀傳播學門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發表，感謝評論人陳世敏教授及汪琪教授的指教。作者也感謝本刊匿名評審所提出的寶貴意見。

***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助理教授。E-mail: maco1049@mails.fju.edu.tw

壹、緣起

半世紀來，台灣的傳播研究在社群成員的播種與耕耘下，已由一片荒蕪發展成欣欣向榮的景象。這個學門的成長與茁壯可從以下面向看出來。

首先，研究基地逐漸擴展。台灣傳播研究的主要機構是大學的傳播系所。1954年，政大新聞研究所設立，這是國內第一家傳播研究重鎮。之後，世新、文化與輔仁等校陸續成立傳播科系。到了1995年為止，12家以上的大學有傳播系所（鄭瑞城，1995：4）。

其次，研究社群日益茁壯。1950年代，政大新聞所成立時，只有少數前輩學者披荊斬棘（林元輝主編，1995：1-3）。1960年代，戰後第一批留美學人回國，成為研究的生力軍。到了1995年，整個社群有近200位的人力；其中，近六成有博士學位，約五成在美國取得最高學位（鄭瑞城，1995：5）。

又次，研究數量與時俱增。1966年起，國科會開始補助傳播研究。在1966年到1969年間只有7篇報告。1970年到1989年間有52篇。到了1990年代，成長速度加快：1990年到2000年間有236篇；其中，1999年與2000年更分別達到42篇、45篇的高峰（參見「中華傳播學會網站」）。

再次，專業期刊有所增加。早先台灣的傳播研究社群並沒有專屬的期刊；研究者的成果只能棲身在鄰近社群的刊物（如《報學》）。1967年，政大新聞所出版《新聞學研究》。1991年後，輔大的《傳播文化》、台大的《台大新聞論壇》、銘傳大學的《傳播管理研究》等相繼問世，形成多元的論壇。

當台灣的傳播研究卓然有成之際，我們有必要為這個學門進行歷史圖象的分析。主要的原因乃是，知識的生產並不是孤立於歷史的真空中，而是根植於歷史脈絡（Hardt, 1992: xii-xiii）。具體而言，有些歷史

條件可能鼓勵某類知識的生產，而限制其他類型；但是，當這些歷史條件轉變時，新的時代氛圍可能給予研究者全新的刺激，重新開啓他們的想像；他們可能用全新的眼光來觀察環境，因而有了新的世界觀。因此，要瞭解台灣傳播研究的特質，必須用歷史的角度分析其發展。

有鑑於此，本文探討以下議題。一、在歷史的過程中，哪些因素可能影響台灣傳播研究的成形與轉型？當這些因素變動時，傳播研究有何轉變？並進入何種新的歷史階段？

本文的分析將有幾項重要的意義。首先，我們將更能解釋台灣傳播學術的傳統及傳承。其次，我們將更能了解：傳播學術與台灣社會存在著何種辯證的關係。又次，在洞悉歷史運作的機制與邏輯後，我們將更可能掌握歷史的契機，化解可能的危機，以便再創新局，再造新境。

貳、傳播研究史的主要論述與分析

在分析台灣傳播研究史前，本文將耙梳相關的文獻。我們可用理論的假定為依據，大略地把傳播研究史的論述分成以下四類。在它們的基礎上，本文將根據在地的情境提出適切的分析架構。

一、大師巨擘型的論述

第一類可稱為大師巨擘型的論述。它假定：傳播研究史有巨擘級的大師；他們承先啓後，影響深遠。在此假定下，這類研究史詳述「大師」的背景、思想、著作及其對學術的影響。例如，根據 Schramm (1980: 81) 所撰〈美國傳播研究的起源〉，美國傳播學有「四大始祖」；他們來自社會科學的不同領域，師承不同的學派，在傳播領域相遇，開啓了美國傳播研究史上「偉大的一章」。基於此論述，Schramm 的學生 Rogers (1994) 撰寫《傳播研究史：傳記學的途徑》一書，把 Schramm 列入美國傳播學的大師。而且，他認為：傳播學來自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又可上溯近代西歐的社會學；因此，Rogers 遙奉十九世紀西歐社會科學的「巨擘」為美國傳播學的祖師。

這類論述有重要的意義。有些研究者可能影響同儕與後學。例如，1950年代，Schramm在美國的主要大學廣設傳播系所，推行大型的研究。他對美國傳播研究應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這類論述可能有限制。首先，「巨擘」與「大師」固然曾引領風潮；然而，他們也受環境的影響。這些環境的因素包括時代的氛圍、物質的條件、前輩的啟發、同儕的討論以及弟子的發揚光大等。它們是大師與巨擘成長的必要條件。因此，進行研究史時，我們還必須考慮社會環境的因素。其次，「大師」與「巨擘」的界定頗具爭議性。這類論述中，某些成員被尊為「大師巨擘」，其學說被奉為正統；相對地，其他重要的成員卻可能被打入冷宮，其學說也被視為冷門。因此，正如Carey(1997:14)所言：這類論述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即讓成員崇拜某些大師，並持續效忠此傳統。

二、里程碑型的論述

第二類論述可稱為里程碑型。它假定：由於某些研究在方法上或理論上見前所未見，傳播研究得以更上層樓。因此，這類研究史主要臚列「里程碑」的研究。例如，Lowery與DeFleur(1983:22)所著《大眾傳播研究的里程碑：媒介效果》即從美國的效果研究中，選擇十一項重要的研究，逐一描述其背景、過程、方法與結果。

這類論述有其優點。首先，這類研究史詳述主要研究的概念、模式與方法；因此，後來的研究者可以進行類似的研究，以比較不同社會的特質，或了解特定社會的變化。其次，因為這類研究史從特定的觀點來選擇文獻，讀者可從中觀察某類知識的累積過程。

但是，這類論述有可議之處。首先，正如大師巨擘型的論述忽略大師成長的社會條件，此論述可能忽略研究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其次，在此論述下，書寫者從特定觀點收錄某類的研究。因此，所謂「里程碑」的研究可能有很高的同質性。讀者在閱讀這類研究史後，可能認為：知識是直線發展，逐步累積；例如，McCombs在為這本《大眾傳播研究的里程碑》寫序時，即認為：「科學是累積的事業」(「Science is a

cumulative enterprise.」(Lowry & DeFleur, 1983 : ix)。然而，這本書未收錄的研究，與書中的「里程碑」研究相比，可能有不同的知識論、方法論及目的論。它們可能是站在不同位置與基準點上，看到不同的圖像，也發展出不同的知識脈絡。

三、政經結構型的論述

第三類是政經結構型的論述。它是基於政治經濟學的假定：經濟基礎會對意識型態設限。因此，它主要分析：政治經濟的權力結構如何影響知識的生產。基於此論述，Simpson (1994 : 94-106) 所著《高壓統治之學：傳播研究與心戰，1945-1960》即指出：兩次大戰中，在美國軍方的資助下，心戰研究成爲主流，以捍衛美國國家利益；到了冷戰時期，美國政府更補助學術界從事「反共」的宣傳，把這個「主控典範」(the paradigm of domination，即在國家情治與宣傳單位的補助下，研究者致力於探討宣傳技術，意見調查、政治與軍事動員，以傳遞國家的意識型態，進而控制社會)內化到社群的心中，並把它外銷到「反共友邦」，以維持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

與稍前的論述比較，此論述重視學門外政治經濟的因素。這些大環境的因素可能影響時代的氛圍、資源的分配以及社群的價值觀。因此，政經結構型的論述能觀照到之前兩個論述所看不到的部份。但是，這個論述卻可能忽略學門內部的動態運作以及自主性。換句話說，雖然政經結構可能設限，社群成員在特定的情況下，可能意識到這層限制，甚至進行反制。例如，美國的傳播研究者 Smythe 與 Schiller 目睹了美國政府對外國及對美國國內勞動階級的壓制後，即轉向批判的路徑(馮建三與程宗明譯，1998 : 126-127 ; 131)。因此，我們似宜觀察：在政經結構下，研究社群如何運思與運作的過程。

四、典範轉型的論述

第四類論述即關注於：特定的社會情境下學門內部的知識生產。它

可稱為典範轉型的論述。它是受到 Kuhn 所提出的「典範」概念的啓發。根據 Kuhn (1970: 187-198) 對物理學史的分析，學術研究存在著「典範」。「典範」是社群普遍認可的科學成就，提供研究人員特定的模式與答案及可遵循的方向。典範也是「默識」(tacit knowledge)，社群成員只能在行動之中體會與學習，有了共享的世界觀、假定、方法以及應用。但是，當部份研究者發現一些現有的理論與方法所沒有預期到的「異常」現象，卻無法解釋與解決時，學門內可能發生危機，部份成員便嘗試提出新思維來化解危機，並逐漸被其他成員接受。於是，新的典範出現。不同時期的典範是基於不同的世界觀，有不同的假定、方法與應用。

Kuhn 的「典範分析」引發美國傳播學界的討論。首先，1970 年代末期，部份美國傳播學者引用典範的概念反省美國的傳播研究。例如，Gitlin (1978: 224) 指出：美國傳播研究存在著「主流典範」，即站在行政部門的立場，採用行為主義的模式與方法，觀察媒介訊息對個別閱聽人在認知、態度行為上的影響。其次，在 1980 年代初期，美國傳播學界重視西歐的批判研究，也以「典範」的概念對比美國與歐洲的研究取向 (Melody & Mansell, 1983: 109; Slack & Allor, 1983: 212)。再次，有的研究者更以「典範轉型」的架構分析美國的傳播研究史。例如，Robinson (1988: 101-112) 指出：1910 年代，當美國社會朝向都市化與工業化時，部份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者急欲提供系統性的知識以了解並改進社會；這時，美國傳播研究是批判的，也是鉅觀的。到了 1920 年代末，美國商業社會興起，傳播學術接受機構的補助，以了解閱聽人的態度與行為，直到 1960 年代末發生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後，美國傳播學界開始反省主流典範的限制(包括客觀主義的知識論以及功能論的理論位置)。因此，人文取向的方法與西歐的批判典範在 1990 年代進入美國傳播學。

由此可知，Kuhn 的「典範轉型」論述對傳播研究史有重要的意義。它關注社會情境的因素，並進一步分析在情境因素下社群成員如何形成共享的世界觀。因此，它是綜合性以及動態性的分析。「典範轉型」的

論述也將有助於分析：在歷史的辯證過程中，社會結構如何設限，以及在結構的限制下成員又如何採取行動。但是，當我們要援用「典範轉型」的分析時，尚必須考慮本地社會的特質。正如 Kuhn 強調的，知識的生產與社會情境有關。而 Kuhn 提出的分析乃根據西方學術發展的歷程。因此，如果我們要用它來分析台灣的學術史，必須注意到：有哪些特殊的歷史因素可能影響台灣的學術生產？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傳播學術的成形與轉型又有哪些特殊的型態？

五、初探性的分析架構：依附型成長下，台灣傳播研究的典範轉型

由上文可知，傳播研究史的相關論述主要有四類；它們各有優點與限制。大師巨擘型的論述假定：有些思想家開宗派，創絕學，應享有傳學大師的尊榮。但是，此論述可能忽略了：任何大師均是時代的產物。里程碑型的論述假定：某些研究是重要的里程碑。但是，此論述可能忽略了研究的經濟基礎。第三類政經結構型的論述則假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會影響知識的生產。但是，此論述可能忽略了學門內部的動力。第四類典範轉型的論述假定：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下，社群會形成特定的世界觀、方法論及目的論，但我們仍需要進一步掌握本地的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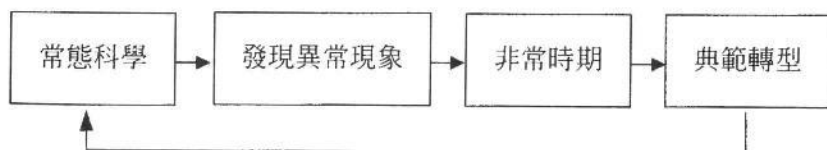
以下即根據台灣的歷史脈絡提出初探性的分析架構。台灣的傳播學術是在 1950 年代發展出來的。當時，在國際的政治經濟結構下，台灣屬於「依附型的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 (陳玉璽，1992)。也就是說，台灣對外國（特別是對美國）有很強的依附；在政治上，台灣依賴外國的承認與保護；在經濟上，台灣依賴外國的資本、技術與市場等。這種依附關係對台灣的發展產生了辯證性的影響。一方面，在此依附關係下，台灣在物質、政治、社會等各方面有所發展；另一方面，台灣的發展卻可能受制於此依附關係 (陳玉璽，1992：18-26)。

「依附型成長」的政經結構可能影響台灣的傳播學術。首先，正如政經結構型論述指出，在依附的情境下，台灣的學術界多向美看齊，以

美為師（楊國樞，1987：8-14；蕭新煌，1987：331-332；程宗明，1999：400-405）。學術菁英赴美留學；學成之後，他們引介所學，並以學到的模式與方法為基本招式，在本地演練。正如大師巨擘型以及里程碑型的論述指出的，這些學術精英引介西學，從事初探性研究，多被尊為「大師巨擘」；他們的作品是同輩及後學臨摹的對象，多被譽為「里程碑」。在這種政經結構的關係與學術社群的運作下，傳播研究的典範可能逐漸形成⁽¹⁾。

然而，在「依附型成長」的政經結構下，台灣傳播研究的「典範轉型」可能與 Kuhn 所建構的「典範轉型」不盡相同。在 Kuhn 的分析中，當部分社群成員發現「異象」並逐漸意識到其重要時，危機出現，新典範可能應運而生。但是，在「依附型成長」的情境下，台灣的傳播研究社群卻必須學習美國傳播學術的最新理論，再根據本地的情況加以引介與測試。當美國的研究被廣為師法時，新的典範成形。因此，當美國傳播典範轉型後，經過一段「時差」（time lag，這是指美國的典範在台灣成形與流行所需的時間，包括本地成員赴美學習當紅的理論，回台引介與測試，最後成為範例的時間），台灣的傳播研究典範可能也跟著改變。圖一即可看出 Kuhn 所提出的典範轉型與台灣的傳播研究典範轉型之不同。

【Kuhn 所提出的典範轉型】



【台灣傳播研究的典範轉型】



圖一：台灣傳播研究典範轉型的初探性模式

而且，在「依附型成長」下，台灣傳播研究可能蘊含危機；而此危機也可能有別於 Kuhn 所說的危機。如前所述，在 Kuhn 的分析中，當部份研究者發現「異象」時，學門發生危機；等到社群成員提出適當的理論與方法時，危機即告解除。然而，台灣的研究者卻不得不向外國學習新知，以了解台灣社會，並趕上「國際」（實際是美國）的水準。但是，美國的知識乃是為了回應其本身的傳播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根源與性質又與彼邦的文化價值、社會關係與制度有關。因此，這些外來的理論可能無法完全切合本地的問題與文化的深層結構（葉啟政，1994：57-60）。結果乃是，台灣傳播社群西去求法，希望求得妙法，以解釋並解決本地的傳播問題；但是，因為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西學東來卻可能有水土不服的情況。

對於上述典範移植可能造成的矛盾，部份社群成員曾意識並提出化解之道。有的學者呼籲應選擇適合本地情境的理論與方法（鄭瑞城，1987：290）。但是，有的學者則認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仍以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來觀照台灣社會，仍無法化解外來理論與本地社會在基本思維與世界觀上可能的差異；因此，他們呼籲應以本地的歷史文化為主，重新提出一套根植於本地的理論與方法（朱立，1995：29-30；陳世敏，2001）；但是，在「依附型成長」的結構下，研究的成果似乎仍然有限。

基於以上的討論，本文將根據修正後的典範轉型論述，分析台灣傳播研究發展的動態過程，並關注學門外的政經結構與學門內的社群運作。具體而言，本文將分析：在依附型成長的政經結構下，台灣傳播研究的社群如何接收外來的典範？又如何根據本地的情境加以引用與應用？當美國的學術典範轉移時，台灣的傳播研究又如何隨之遊移？

參、臺灣傳播研究典範轉型的歷史分析

一、第一期：軍事主義下的「政治控制典範」

1950年代初期，台灣的傳播學術肇建。當時，國府來台建立威權統治，並以「反攻大陸」為正當性的基礎。在「反攻大陸」的宣稱下，國府進一步宣布：在動員戡亂時期，為了國家安全，必須施行多項非常時期的命令，凍結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與自由。

為了穩住「反攻大陸」的正當性基礎，國府有必要進行國內外的宣傳。首先，國府必須爭取美國的支持與承認，才能穩住「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正當性。而且，國府也必須建立國內的文化霸權。因此，1950年代，國府致力於國內外的文化宣傳。例如，國府〈四十三年度宣傳工作計畫綱要〉即指出，宣傳工作在反共復國的大戰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它並說明，宣傳工作的主要任務有「對內為加強精神教育...完成反攻之準備...對國際為爭取友邦更多同情與援助。...」（改造出版社，1954：57）。

在進行宣傳時，國府有必要控制教育與學術。國府所訂定的〈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綱領〉即指出：在國家總動員的時刻，文化改造運動的重要項目之一是對教育與學術的控制與動員，如「創設或恢復重要學會及科學團體，成立全國學術團體聯合會，形成學術界之總結合」（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1952：37）。在此動員下，大學教育即應「一面保持學術研究之獨立精神，一面適應國家總動員之實際需要，現有院系之設置及課程之編配，均應本此原則加以適當調整，務求學術研究與國防民生密切配合」；教育部負責督導「各大學及學術研究機關，發揚學術救國之精神」（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1956：13；27）。

在此「學術救國」的氛圍下，政治大學在1954年復校，以「配合國策及培養高級通才」（謝然之，1963a：189）。政大最早成立的四個研究所（政治、外交、教育及新聞）均與政治及文化宣傳有關。其中，新聞研究所對文化宣傳十分重要。第一，它是新聞教育機構，可以培養新

聞及宣傳人才。第二，它是研究機構，可生產論述以正當化國府對傳播部門的控制。

爲了確保傳播學術達成「學術救國」的使命，黨國的宣傳大將出馬擔任傳播學的掌門人。在上級的指派下，國府宣傳部門的總舵主曾虛白擔任政大新聞所主任（1954-1969）。在抗戰時期，曾虛白是軍事委員會宣傳處處長；戰後，他出任新聞局副局長；來台之後，他更挑起國府的宣傳重責，擔任「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第四組的主任，負責「管理宣傳工作之指導設計」，也擔任〈本黨當前新聞宣傳指導綱要草案〉的小組成員（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2：2；503）。同時，他在擔任政大新聞所主任期間，仍掌理中央通訊社，負責對外宣傳（馬之驢，1986：76-79）。另外，國府文宣工作的要角謝然之在1956年擔任政大新聞系系主任。抗戰時，他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第一處處長；來台後，他擔任省營《新生報》社長。

在國府親美的政策下，上述傳播學的掌門人以美國的新聞學理論爲藍本，建立台灣的傳播學術。二次大戰期間，曾虛白擔任中央政治作戰學校新聞學院副院長時，即推動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合作（余夢燕，1953：60；謝然之，1963a：184-185）。1954年，曾虛白主持政大新聞所後，又聘請美籍學者來台講授新聞學，進行「中」美學術交流。相對地，在冷戰的情境下，美國也樂於補助此「學術交流」。美國國務院特別成立半官方的亞洲基金會，提供亞洲國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援助，以從事反共之宣傳（馬之驢，1986：109-110）。在該基金會的補助下，1953年到1969年間，有7位美國新聞學教授來台講學（曾虛白，1968：2-3）。

當台灣傳播學門持續接受美式新聞學時，美國新聞學的重要概念進入台灣的新聞學術。例如，曾虛白（1965：58）討論「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時，即引介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源流、美國社會責任論者的主張以及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對「新聞自律」的努力。謝然之（1963b：4）也肯定：「新聞自由爲人民的基本權利，無論平時或戰時，都應當予

以合法的保障」。在這些師長的引領下，1954 年到 1968 年間，89 篇政大新聞所的碩士論文中，新生代的研究生主要討論新聞學的相關問題，半數以上即屬於傳統新聞學的範圍。以傳播層次而言，它們主要研究報業；以主題而言，它們主要討論新聞史（12 篇）、新聞編輯與寫作（10 篇）、新聞法規（8 篇）、報業的經營（7 篇）與新聞自由與自律（5 篇）（曾虛白，1968：4-5）。

但是，對於美國新聞學的理念，本地的研究者並非照單全收。在「學術救國」的召喚下，他們會根據黨國宣傳的需求加以闡釋。首先，他們肯定西方新聞自由的價值，但認為：在臺灣的情境下，新聞自由應該受到限制。本地研究者所提出的第一個理由是戰時的國家安全。例如，謝然之（1963b：4）指出：「如果新聞自由超出了戰時應有的限度...乃至為匪諜所利用...新聞自由本身亦必失去合法的保障」。他們所持的第二個理由則是「公共利益」。例如，曾虛白（1965：61）指出：「倘公眾對傳播事業的願望無法達成，政府不得不插身進去為公眾服務」。以上「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的理由，有助於正當化國府對媒體的控制，因為當時國府控制媒體的理由即包括「戰時需要說」以及「避免惡性競爭說」（包澹寧，1995：234-235）。

其次，本地研究者也會駁斥美國學說中對國府不利的部份。例如，曾虛白推崇美國民意理論家 Lippman；但是對於 Lippman 的「親共」立場，曾虛白則大加鞭撻。當時，Lippman 主張：美國應與蘇聯修好，並務實地承認「兩個中國」。但是，一旦美國的反共立場軟化，國府的正當性也將隨之弱化。因此，曾虛白（1963：8）舉「大陸人民冒生命危險穿越鐵幕」為例，以駁斥 Lippman 的親共立場。

綜上所述，在反共的氛圍下，傳播學界本著「學術救國」的情操發展學術。他們以美國的新聞學為藍本，討論新聞自由的哲學與新聞的歷史與實務。但是，他們在轉譯美國理論時，多以黨國的利益為重，選擇性地接收、詮釋與批評外來的理論。因此，研究者多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與立場。

到了 1960 年代，台灣的傳播學術有了新思維——行為主義的大眾傳播研究；這個變化可能源自美國傳播學術的改變。1940 年代以來，美國的新聞學研究逐漸以行為科學的方法代替人文的方法，主題上，也以過程與結構研究代替報人的研究（石永貴，1969：119）。行為科學的大眾傳播研究在 1950 年代於美國建制。因此，1950 年代末期，台灣的學者赴美進修時，即躬逢其盛，學習到此新興的研究取向。

戰後第一批赴美進修的傳播學者，多曾在官方媒體中工作，由於表現優異，得到獎學金，申請到美國一流大學的新聞傳播研究所。例如，王洪鈞曾任《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與資料中心主任。在報社的補助下，他前往密蘇里學院攻讀碩士學位（王洪鈞，1993：106）。徐佳士曾任《中央日報》的編譯主任，在明尼蘇達大學取得大眾傳播學碩士，又在亞洲基金會的補助下前往史丹福大學研究（周安儀，1981：243）。漆敬堯曾任《台灣新生報》的採訪主任，1950 年代末期，他前往加州大學攻讀碩士。朱謙曾任英文《中國日報》編輯，在史丹福大學取得大眾傳播碩士與博士，1960 初期年回台任教（朱謙，1995：11）。他們在美留學時，學到當時新興的大眾傳播學。朱謙與徐佳士更分別是 Schramm 的嫡系弟子及私淑弟子。

1960 年代初期，這批留美的傳播學者陸續回國，開始引介美國主流的大眾傳播學研究。1964 年，朱謙在《報學》發表〈大眾傳播理論體系〉一文。1966 年，徐佳士也出版《大眾傳播理論》專書。在這些作品中，他們先介紹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大師巨擘」。朱謙（1964：24）介紹了美國主流傳播學的大師。徐佳士（1984：12）也介紹了傳播學的「四大始祖」，並稱 Schramm 是「（為傳播研究）開創一條新道路的人物」。其次，他們並基於美國主流的社會學思想——結構功能學派，提出大眾傳播與社會的關係。朱謙（1964：26）指出，傳播在社會中有「警戒的責任」、「內部各份子間的維繫」、「文化的傳遞」的功能。徐佳士（1984：47-57）也以專章介紹傳播的結構與功能。再次，他們也把傳播研究界定為效果研究。在結構功能理論與行為主義的影響下，美國主

流的大眾傳播研究以量化的方法，研究媒介訊息對閱聽人的效果。在這個取向的影響下，朱謙（1964：24）闡明：「大眾傳播的主要目的乃在探討其對於人行爲方面的影響...我們主要的興趣乃在研究大眾傳播的效果」。同樣地，徐佳士（1984）的《大眾傳播理論》一書九章中有五章是關於閱聽人及效果。

以上關於美國的大眾傳播理論與方法，也被納入傳播教育的課程。例如，朱謙回國任教時，即開設傳播學理論、傳播學研究方法和內容分析（朱謙，1995：11-12）。到了1969年，政大新聞系也在大四的課程中加入「大眾傳播學研究方法」（陳世敏，1970：49）。因此，在1960年代末期美國主流的大眾傳播學已登台。

但是，這個時期，行爲主義的大眾傳播研究仍處於引介的階段。例如，1960年代的國科會報告共有6項。以探討的主題而言，它們以媒體制度（3篇）、新聞史（2篇）及哲學（1篇）居多，並沒有媒介訊息、閱聽人及效果的研究。再以研究方法而言，它們以文獻分析（4篇）與理論論述（2篇）爲主，尚未使用社會科學的方法。

到了1960年代末期，傳播研究社群似乎意識到有必要運用學到的方法，檢視外來理論在本地的適用性。例如，當時新生代的研究者陳世敏（1970：48-49）呼籲：「應從事基本的傳播研究」，即在本地進行研究，因爲「這套理論未必能適應中國的土壤」。他並主張，傳播社群應強化行爲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才能「登堂入室」、「剝析肌理」。陳氏這個宣示可能預示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它也爲即將發生的典範轉型埋下伏筆，留下註腳。這個註角顯示：在這個典範交替的時刻，新生代的研究者正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他們正計畫學好理論與方法，在本地社會進行測試。可以預期的是，他們即將糾合群力、呼朋引伴、扶老攜幼，用新的觀點與方法來研究台灣的傳播現象。他們也將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真槍實彈地在台灣的田野中「帶兵操練」。

二、第二期：發展主義下的「發展典範」

1960年代，經由戰後第一批留美學人的引介，台灣傳播研究的社群已逐漸熟悉美國行為主義的傳播研究。1970年後，研究社群持著學到的理論與方法，以本地社會為研究場域。這一年，在國科會的補助下，徐佳士研究「二級或多級傳播理論」在台灣的適用性，並與政大新聞所同仁組成團隊，研究「電視對兒童的影響」。

同時，台灣的研究社群也持續接受美國主流的傳播研究。1970年後，加入傳播研究社群、且從事國科會研究的研究人員，共有12位；其中有11位曾前往美國研讀大眾傳播（林麗雲，2001）。他們不斷地引介美國的傳播研究。而且，國內傳播學界也繼續延請美籍學者前來講學（林元輝主編，1995：7-11）。

台灣的傳播學術社群不斷向美國取法的情況，可能與當時台灣持續依附美國有關。1970年代，美國有意向中國大陸扣關。因此，國府試圖運用各種方法加強對美宣傳，教育、文化與學術即被認為是救急之方（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80：20）。這種國際宣傳的政策方向可能影響台灣學術界的對美依附。

當學術社群不斷向美國學習最新的理論時，國內的情境與需求也可能影響到他們的選擇。這時，當「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越來越不可能實現時，國府改以物質建設來正當化其統治，台灣的威權主義政體也逐漸從「軍事主義」轉變成「發展主義」。在1950年代，台灣執政者主要的政治目標是軍事行動，政府預算八成五以上是用在國防上面。到了1960年代，政府不得不改口，宣稱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達到反攻大陸的目的，推動經濟改革與大型國家建設發展為目標（Gold，1986：69；92-93）。1970年代，執政黨的年度計畫即以國家建設為主要目標（中國國民黨黨史工作委員會，1980：109）。在「國家發展」目標的召喚下，當時台灣留美學人多引介「發展理論」；即使自196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發生了澎湃的社會運動，美國學界已出現批判的思潮，台灣的

留美學人仍選擇性地接收，主要學習「發展理論」（傅大為，1991：85）。

在「國家發展」的召喚下，台灣傳播研究社群投入國家發展的宣傳計畫。當時執政者爲了使全民支持與配合發展的目標，需要推動政令宣傳計畫，如「宣揚政府四大公開政策、及十項建設、和各項施政績效，以證驗三民主義的優越性」（中國國民黨黨史工作委員會，1981：597）。國家機關爲了鼓勵學術界從事相關的宣傳研究，發展了一套資源分配的機制；例如，行政部門多直接委託研究者從事中、小型及實用性質較高的研究，研考會與國科會則負責規劃較大型的傳播研究（祝基濤，1986：79-80）。相對地，對於傳播研究社群而言，協助國家發展似乎正符合他們作爲知識份子的角色。正如鄭瑞城（1987：13）所說的，「如果學術的最終目的是在濟世，則傳播研究者及實務工作者好談傳播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及功能，亦正表現了知識份子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及民胞物與的胸懷」。因此，基於本身的學術訓練與使命感，社群成員願意配合國家目標，分析本地的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雖然這個時期的社群成員與黨國的關係已較疏遠（例如，在擔任教職前後，他們似乎較少擔任黨政職務）（林麗雲，2001）。

因此，自1970年代以來，傳播社群主要關心的是大眾傳播媒介如何促進國家發展。在國科會委託下，徐佳士等（1978a：1-2）研究「台灣大眾傳播過程與民眾反應」。他們即闡明研究者的終極關懷是在了解「我國的大眾傳播媒介促進國家發展方面究竟擔當著一個怎樣的角色？...發揮到什麼程度？...我們應該怎樣圖謀補救？」在研究這些主題時，研究社群主要採取 Schramm 與 Lerner 在1960年代所提出的「國家發展理論」。這個理論指出：當一個社會從「傳統社會」變成「現代社會」時，媒介可以形塑民眾的「現代化」人格。在此理論的引導下，自1974年起，徐佳士等進行「我國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總計畫。此計畫又分爲三類主題：媒介體系的功能分析、訊息的傳布過程，以及訊息對閱聽人個人的效果研究（徐佳士等，1978a：2；1978b：2）。他們主要是用量化的方法，處理大量的個人資料。而且，正如以下的分析，這

三類主題是這個時期研究的主流，由中壯年成員推動，並成爲年輕學子的「範例」。

第一類是閱聽人研究。這類研究主要用行爲主義的模式，分析閱聽人的傳播行爲、使用媒介的動機與需求，以及受到媒介的影響。1974年，徐佳士等（1976：27）調查台灣地區民眾的傳播行爲時闡明「假使要探究媒介對它（閱聽人）產生什麼『效果』，有什麼『功能』的話，比較切合實際的途徑是先行瞭解閱聽人使用媒介的動機，以及所獲滿足的程度」。在可蒐集到的這個時期（1970年到1989年）的39篇國科會報告中，二成八屬此類。而且，這段期間，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共222篇；其中有83篇屬此類。

第二類是大眾傳播過程與民眾反應的研究。這類研究企圖找出訊息與閱聽人之間的中介變項，主要是基於Lazarsfeld等人的「兩級傳播」與「意見領袖」的模式。徐佳士等（1978a：17）在針對全國民眾所做的研究中發現，「意見領袖」在台灣並不顯著。在39篇國科會報告中，9篇屬此類。也有10篇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研究特定議題的消息傳布過程。

第三類則是關於媒介體系表現的研究。研究者主要關心：媒介次體系對社會與國家的功能。在評估媒介體系的表現時，研究者主要是用內容分析的方法，評估媒介訊息的表現。例如，李瞻針對三大日報進行內容分析，觀察其正功能及反功能（李瞻，1976：1）。這類研究主要是從結構功能論出發，視媒介爲獨立的次體系。因此，研究者較不會從社會權力的角度解釋內容分析的結果。在39篇國科會報告中，6篇屬此類；有70篇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屬此類。

由此可知，這段期間的傳播研究主要包括以上三類。它們主要的分析層次是大眾傳播，主題包括閱聽人、效果與訊息。在目的論上，研究者致力於提高大眾傳播的正功能，以把發展性的訊息有效地傳遞給大眾。在理論上，研究者從結構功能論出發，把媒介當作社會中的獨立的次體系，較少探討社會權力結構對媒介次體系的控制。在評估媒介功能

時，他們較少從鉅觀的角度分析媒介對社會及文化的影響；相反地，他們主要是用微觀的行為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分析媒介對閱聽人的功能以及影響。在方法上，他們主要是以社會科學調查法與內容分析法；而且，隨著研究變項的逐漸繁複，統計方法也由描述性統計進化到較高階的分析方法（祝基滢，1986：86）。

因此，在這個時期，傳播社群中存在著一個主流的典範。在「國家發展」的目標下，社群以「大眾媒介與國家發展」的研究為範本，以其隱含的結構功能論及行為主義作為假定，著手分析媒介（主要是訊息）的功能及對閱聽人（在行為方面）的影響。因此，1970年到1989年間，39篇國科會報告中，以傳播層次而言，大部份探討大眾傳播（佔四成六）；以主題而言，大部份集中在訊息、閱聽人與效果（六成三）；以理論而言，四成三（17篇）以行為主義分析閱聽人的傳播行為及效果；三成三（13篇）從系統論探討媒介的運作及表現；以方法而言，半數以上（五成四）採用社會科學調查方法（林麗雲，2001）。

當「發展典範」成為主流時，舊的「政治控制」典範行將式微。如前所述，在上個時期，社群成員主要站在國家的立場，從事新聞自由哲學及新聞史的研究。但是到了這個時期，在國科會研究中，這類型的研究只有一成左右，遠不及閱聽人、效果與訊息的研究（林麗雲，2001）。而且，222篇的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中，只有13篇屬新聞哲學與歷史的研究。這顯示舊典範已逐漸被「發展典範」取代。

雖然「發展典範」成為主流，但本身卻有限制，那就是，國家發展理論本來是關注整體國家社會的現代化。但是，1960年代，受到行為主義的影響，把研究焦點放在個人的現代化，卻忽略社會結構的問題（瞿海源，1989：117）。Schramm在1976年即坦承發展典範的限制，並呼籲應「回到原來的設計桌上」（轉引自陳世敏，1983：22）。但是，1970年代台灣傳播學界卻繼續奉行此典範，直到1980年代初期，部份的留美學者才引介美國學界對發展典範的反省（陳世敏，1983：24-28；潘家慶，1987：41-45；鄭瑞城，1987：7-11）。

更嚴重的是，這個典範是根植在美國社會，可能無法完善地回應台灣威權體制的傳播問題。換言之，此時期的典範以功能論為假定，並受到行為主義的影響，以微觀的角度分析媒介次系統及其對閱聽人的影響，因此可能忽略了社會體系中隱藏的控制、矛盾與衝突。但是，台灣威權體制卻充滿著由上而下的控制，蘊育著由下而上的對抗與對立。因此，發展典範可能無法完全觀察到台灣傳播體系中結構性、控制面以及對立性的問題。1970年代，當威權體制隱含的矛盾尚未引發衝突時，理論的限制尚不明顯。但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威權體制的矛盾一一浮現，社會的衝突也一一爆發。傳播研究社群所進行的功能性以及微觀層次的研究，似乎顯得有點捉襟見肘，使不上力。

這時，傳播研究社群之外，社會中基進的團體引介西歐的社會理論來批判台灣社會，包括文化生產。例如，當傳播研究社群埋首分析媒介的「守望」功能時，《南方》（雜誌）高呼：「大眾傳播的公信力破產了。」（江冠明，1988：100）。又如，當社群成員尋覓大眾媒介的「娛樂」功能時，《南方》援用法蘭克福學派的論述，直指「新資本主義世界中，文化商品的氾濫...孤寂的、原子化的消費者誕生了...」（曾澍基，1988：111）。而且，當成員在抽樣與統計方法上精益求精時，《南方》則引用Foucault的說法，指出「...在經濟部門急速擴展，科學專業要求逐漸高漲的情形下，知識本身絕非純潔的真理...」（南方望，1986：13）。

社會上激進的思想似乎並沒有立刻撼動傳播學門。此時，批判性的思維、概念與分析似乎很少出現在台灣傳播研究中（如國科會報告、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等）。也就是說，1980年代中期，當台灣社會發生重大變化時，研究社群的理論視野似乎並沒有因此而發生立即的轉折。

但是，這並不是說，台灣傳播學門內完全沒有新思想，而是說，這些新思想是源自美國學術界，而似乎不是為了回應台灣本身的社會問題。1970年代末，美國傳播研究已正視西歐的批判傳統。當時正在美國攻讀傳播學的台灣學生中，有人注意到此一思潮，並加以引介。例如，當時陳雪雲在史丹福大學求學，回台後，她在《報學》上介紹「批評的

大眾傳播研究」(陳雪雲, 1982: 64-65)。1985年, 當英國的文化研究者 Hall 應邀到美國講學時, 張錦華正在美國留學; 她也在《新聞學研究》上介紹這位走紅美國的「文化研究大師」(張錦華, 1987: 91)。

由於美國傳播學界逐漸重視歐洲的批判研究, 台灣部份傳播社群成員也前往英國進修, 例如, 陳世敏及鄭瑞城分別在 1980 年代初期到英國研究。同時, 當「行政典範」的限制已躍然紙上時, 少數年輕學者前往歐洲深造; 例如, 馮建三選擇到英國攻讀博士學位, 因為「當時美國的行政研究對我已失去吸引力了, 英國則是另一個選擇。」(親身訪問, 2001 年 9 月 18 日)

但是, 1980 年代末期, 批判性的研究仍處於引介的階段。首先, 這個時期, 研究社群很少以批判理論分析本地的傳播問題, 青年學子還沒有可師法的範例。其次, 當時在美國或英國研習批判理論的學者尚未返鄉。到了下個時期, 他們即要手執批判的利器, 回到台灣社會的戰場。

三、第三期：自由化下的「多元典範」(1990 年—現在)

在上期的基礎上, 行政性研究仍居主流, 但其重要性似乎稍減。以國科會的報告而言, 在研究的層次與主題上, 似乎沒有明顯的變化。前兩個時期, 均有八成以上屬大眾傳播層次, 五成五以上探討訊息、閱聽人及效果等主題。但是, 研究的理論假定與方法卻似乎略有變化。以理論假定而言, 上個時期, 八成以上的研究是立基於行政典範的理論; 1990 年代則降至六成七; 另有一成五屬批判論, 一成六偏向建構論。再以方法論而言, 上個時期, 有五成三的研究運用社會科學的調查法; 1990 年代, 只有三成八採用調查法, 另有些研究採用偏質性的方法, 如深度訪談法(二成七)、文本分析法(一成四)(林麗雲, 2001)。

由此可知, 行政典範的地位雖略有動搖, 但仍居主流。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 以學門內部而言, 行政典範的研究者仍是社群的主力。面對新科技或新議題時, 他們仍可能運用原有的思維與方法。第二, 以學門外部而言, 1990 年以來, 台灣的政治制度逐漸朝向選舉政

治，而經濟制度則是資本主義。在此政經制度下，政治與商業部門均需要行政性研究的資料，以提高其傳播的效能，進而有效地控制與預測環境。因此，行政性研究仍居主流。

但是，當主流典範香火鼎盛時，批判典範也日漸興盛。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二。首先，以學門內部而言，在 1980 年代中期，少數新生代的傳播學者出國攻讀批判性理論。這類理論致力於檢視特定社會情境下的權力結構，並結合理論與具體社會改革 (Littlejohn, 1999: 225-226)。自 1990 年起，少數批判理論的學者手握批判的論述工具，進入台灣的場域。例如，張錦華 (1990: 103) 開砲，指出主流典範的限制。同年，馮建三也動手在報章雜誌上「解構資本主義的傳播符碼」 (馮建三，1992: 11)。其次，以學門外部的情況而言，當台灣社會逐漸開放時，批判研究有了立足之地。自解嚴以來，社會上有更多批判的力量釋放出來反省權力結構的問題。在此氛圍下，部份社群成員嘗試用不同的途徑分析傳播體系中關於結構以及控制的問題。例如，1991 年，鄭瑞城等 (1993: v) 著手「解構廣電體制」，「嘗試從學術、歷史及批判的角度來解釋台灣的廣電媒體」。在這種情境下，批判學派的理論逐漸受到重視。

於是，批判理論逐漸成為傳播學的常態科學之一。首先，1990 年代出版的傳播理論教科書即納入批判理論。例如，翁秀琪 (1992: 1) 的《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開宗明義把美國與歐陸的研究並列，而且專章介紹批判理論的主要流派。同樣地，林東泰 (1997: 38) 的《大眾傳播理論》第一章也基於 Rosengren 等對社會理論的分類，介紹大眾傳播學的「主控的典範」與「異議的典範」。其次，1990 年以來，部份新聞傳播所也開設批判性質的課程。例如，在 1990 年，輔大大傳所開設「媒介批評與方法」、「批判理論」、「質化研究」等批判性質的課程，並在 1991 年時加開「文化研究專題」；1991 年，政大新聞所也大幅開設批判性的課程 (鍾起惠，1996: 72)。再之，從事批判性研究的成員有所增加。例如，1990 年以來，國科會的研究案中，31 篇屬批判性質；這些

研究的作者共有 16 位；其中 14 位是在 1990 年後進入社群。這似乎顯示：部份傳播系所考慮任用批判理論專長者（林麗雲，2001）。

弔詭的是，當批判社群的人力增多時，理論的立場也有了分歧。主要的原因乃是，在西方左派思想的發展中，不同的理論家會做不同程度的修正，也產生不同的理論與學派。國內學者在吸取這些知識時，可能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站在不同的理論位置。這些因素可能包括個人求學時投效的學派，回國後學術上的利基位置，以及個人的價值判斷等。根據本體論的假定，批判理論大致可分為偏向結構主義以及偏向後結構主義兩派（Littlejohn, 1999：225-227）。這兩個學派下的各門路，似乎都出現在台灣的傳播研究中。

第一大類是偏向結構主義的理論，較強調社會權力結構。首先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假定社會的下層結構會對上層結構設限。因此，研究者主要研究媒體的經濟基礎。馮建三即高舉政治經濟學的旗幟，主要關注：「為什麼隨著歷史的往前推移，大眾傳播媒體在資本積累及統治意識型態的建構過程，佔據的位置日見顯著？...又為什麼會在不同階級身上，刻度明暗不一的印痕，致而失調並引發衝突與變遷」（馮建三，1995：viii）。

其次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這個學派也同樣承認下層結構的重要性，但是它更重視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工業的運作。在法蘭克福學派中，Habermas 提出「公共領域」的概念，期望建構獨立於國家與市場的公共論述空間。這個規範性的概念受到社群成員的重視。例如，有 4 篇國科會的報告以「公共領域」的概念評估媒體的表現。

再次是 Bourdieu 的「結構化論」，假定社會結構對個人設限，但個人的行動也可能改變或強化此結構。在這個假定下，研究者主要是分析：在相關的社會條件下，個人形成哪些機制（mechanisms）？如何複製或改變社會結構？在孫秀蕙與馮建三（1995：86-87）所著的《廣告文化》中，即介紹這個理論裡關於階級、文化資本及文化品味之間的動態過程。

再次是 Gramsci 的霸權論。這個理論指出：社會中的權力集團必須爭取文化霸權，才能達到社會控制；而反抗團體也必須形成結盟，提出強而有力的論述，以挑戰這個統治集團。基於霸權論，張錦華研究：在重要的議題上，大眾媒介的迷思假設（張錦華，1994：96）。在她的指導下，1991 年有 3 篇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分析大眾媒介如何構連意識型態的迷思。以上是屬於第一大類的批判理論。

第二大類的批判性理論則較偏向後結構主義。這類理論傾向認為：社會上並沒有固定的權力結構。在傳播研究中，主要包括文化研究以及後現代的論述分析。首先，文化研究假定：社會上交織著複雜的權力關係，不同的團體在生活場域中進行抗爭產生新的文化意義。因此，研究者關注：在不同的生活場域中，人們如何創造意義。例如，孫秀蕙與林芳玫（1995）以日常的家庭生活為主題，分析家庭成員如何收看電視。陳雪雲（1997）研究通俗文化中消費的動態過程。

其次，後現代主義的研究假定社會中沒有固定的權力結構，符碼並沒有反映真實，而變成了超真實。例如，林芳玫（1998：8-9）基於 Baudrillard 的「擬象說」（即在「擬象時期」，仿造的真實成為超真實，以細微的差異來維持虛幻的意義）指出：A 片既沒有反映真實，也沒有扭曲或污衊事實，A 片製造超真實，以符碼再生產更多消費的慾望。

除了以上主流以及批判典範外，當美國傳播學術逐漸注意到人具有詮釋及反思的特質時，「建構論」（constructive theories）也在台灣的傳播社群中發酵與發聲。根據 Krippendorff（1993：34-37）的分析，美國傳統的傳播研究是基於客觀主義的假設（人可運用符碼，客觀地反映外在世界），較不會探討人如何接受、詮釋以及製碼。相對地，建構論則假定：社會團體或個人會根據其認知基模建構符號真實；因此，符碼是被建構出來的，不是客觀的。在此假定下，建構主義者關注：人及社會團體經由何種認知基模以及語言機制以建構符號真實（Krippendorff，1993：37）。

以上建構論的思潮影響到台灣的傳播研究。1990 年代以來，部份

的社群人員放棄客觀主義的假定，把人當作主動的詮釋者。因此，他們研究個人或團體如何建構符號真實。目前台灣傳播社群中，偏向建構論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三。

首先是認知學派。這個學派把人看做具有反思與詮釋能力的主體。因此，研究者關注：人類的資訊處理過程中，認知基模運作的複雜過程。鍾蔚文所著《從媒介真實到主觀真實：看新聞，怎麼看？看到什麼？》即是偏向建構論中的認知途徑。鍾蔚文是在史丹福大學求學時，進入認知科學的殿堂（鍾蔚文，1992：vii）。回台後，他即推動一系列有關「認知」的研究。他基本上假定：「從媒介真實到主觀真實，其實就是認知的歷程...是一種重建（reconstruction）過程」（鍾蔚文，1992：2）。在他的指導下，每年約有1到2篇的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採取認知的分析途徑，探討個人及社群（如記者）如何處理及組織資訊。

其次是「社會建構論」（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此類理論假定：新聞真實的產生是歷經一連串互動過程，包括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編輯的工作方式以及社會文化情境與意識型態等（林芳玫，1996：45）。因此，研究者主要分析：在特定事件發展的過程中，各個社會團體如何發聲，爭取發言權，並在媒體所提供的公共領域中取得一席之地（林芳玫，1996；陳雪雲，1996）。

再次是偏向詮釋論的觀點。詮釋論者認為：符號真實是個人主觀的詮釋。在詮釋的過程中，人會運用各種語言策略，帶領讀者進入其想像的世界。基於這個假定，研究者主要分析：人類論述中的語言策略以及其中作者的視野與世界觀等。例如，新興的語藝批評即屬於此類。這個研究方向主要是由林靜伶推動。她在美國求學時進入了語藝的領域；回台後她闡明：語藝理論與批評「關心人的論述如何具有吸引力，如何具有說服力？人的論述如何呈現或反映人的思考、價值觀、世界觀？」（林靜伶，2000：2；7）。她主要以語藝批評的方法分析文本中的語言策略以及隱含的世界觀。在她的指導下，1992年到2000年間，輔大大傳所的101篇碩士論文中，27篇屬此類。

肆、結語

本文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台灣的傳播研究如何成型與轉型。本文檢視了傳播研究史的主要論述。首先，大師巨擘型及里程碑型的論述側重個別傳播研究者或其經典研究的貢獻。但是，這兩類論述可能忽略：大師巨擘及經典研究可能會受到歷史情境的形塑。政經結構型的論述則關注：學門外的政經勢力如何影響知識的生產，但可能忽略學門內部的動力。典範轉型的論述則關照：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下學門內部的運作。

接著，本文根據本地的情境，發展出初探的分析架構。這個架構指出：在依附的情境下，台灣的傳播學術受到中心國家的影響，當美國的傳播學有了新思潮時，本地社群可能學習、引介與測試；因此，美國當紅的學說，經過一段時間的引介後，可能在台灣發燒一陣。但是，在移植的過程中，社群成員也會根據本地的情境與需求，加以轉譯或轉用。

基於以上的分析架構，本文對台灣的傳播研究史提出一個歷史圖象的分析。首先，台灣的傳播學術建制於冷戰時期。當時，由於國府與華府建立依附的關係，台灣的傳播學術也接受美式的新聞學。但是，在「學術救國」的召喚下，社群成員基於黨國利益來詮釋「新聞自由」，並駁斥部份美國學者不利於國府的言論。直到1960年代，當戰後第一批留美學人歸國之後，「行為主義」的研究登台，開啓了新的知識之窗。1970年後，美式效果研究蔚為主流。在國家發展的目標下，傳播社群運用學到的「傳播與國家發展理論」以及行為科學方法，發掘媒介的功能和效果，以供行政單位製作發展性的訊息。但是，「發展典範」關注功能面、短期、個人的分析，對於台灣威權主義社會中控制面、長期的、以及整體性的問題卻無言以對。因此，1980年代中期，在結構性的矛盾與衝突浮現台面時，「發展典範」似乎無力招架，也無法回應，直到批判性的研究經由美國轉口進入島內，新的思維才開始進入社群。1990年代以來，行政典範仍居我國傳播學的主流，但批判典範也分庭抗禮。而且，隨著西方左派陣營的分化，各種批判的招式也出現在台灣。同時，當美

國傳播研究的建構論興起時，偏向建構論的取向也在台灣開展。

由此可知，在台灣傳播研究的發展中，典範轉型的特質與 Kuhn 所分析的不盡相同。在 Kuhn 的分析中，典範轉型的動力是社群成員發現了異常的現象。台灣傳播學門的典範則是跟著美國典範的迴轉而旋轉。而且，Kuhn 的分析中，危機是「可解除的」，但台灣的危機卻是結構性的、經常性的。主要的原因乃是，台灣研究社群援用外來理論與方法，以解釋及解決本地的問題，而外來的理論乃根植於彼邦特定的問題、文化價值及哲學思維。因此，當台灣的傳播研究社群手拿工具進入研究場域時，卻可能因為工具不適用所以無功而返。

對於上述的矛盾與危機，部份社群成員心有所感，並進行反思。在思索的過程中，他們即根據自身認識論的立場，提出策略：

一、普遍主義者的反思

普遍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具有普遍的規則，研究者必須追求普遍性的理論，而非在地性的個案研究（陳韜文，2000：3）。普遍主義者的途徑有其優點：正如陳韜文所言，普遍性的理論可做為在地與全球對話的界面。但是，在依附性的情境下，如果在地學術社群繼續拿西方的理論來觀察本地社會，則本地傳播學術的發展，將可能如朱立（1995：23）所批評的，「它的生命則是非本土的，而是與中心地區相聯而來的。因此，邊陲地區往往只在替中心地區從事學術『加工』，鮮有獨創的自主之見。」在這種情境下，在地的社會將永遠只是被用來對比西方社會，而失去其主體性。

二、修正主義者的反思

修正主義者認為：在地社會有其特殊性，但研究的原則是不變的。因此，研究者應以本地重要的問題為主，選擇適當的理論與方法，再「視情況做適當的修正」（鄭瑞城，1987：290）。修正主義者已意識到應以本地特有的問題為主，並應修正外來的理論與方法。反之，從相對主義

者（見下文）的觀點來看，理論以及方法乃源自特定社會的思考模式和集體認知（陳世敏，2001；葉啓政，1994：69），如果研究者只稍微修正理論與方法，可能仍然無法掌握社會的本質。

三、相對主義者的反思

相對主義者認為：每個社會均有其特殊性；理論與方法正是源自特定社會的思考模式和集體認知。因此，很少有理論與方法能解釋或解決所有的個案。他們提出「向文化轉」的呼籲，即未來傳播研究應採取歷史社會學的視野來檢視特定地區的傳播文化（陳世敏與夏春祥，1998：1-3；陳世敏，2001）。例如，徐佳士等發起「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的研究」，有系統地進行「傳播研究中國化」，建立中國傳播理論。他們嘗試從歷史（特別是中國歷史）中，提煉出更適當的理論與架構。但是，當他們企圖從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中建構出「本土」的傳播理論時，可能會遇到困難是，在長期的歷史變遷和數次的疆域伸縮分合之下，中國文化已有很高的異質性與混合性，而且境內各個地區有不同的歷史經驗，因而可能有不同的思考模式與集體認知。

正當傳播研究社群急欲提出解決之道時，本文指出：未來宜重視研究的主體性。主要的原因乃是，典範移植的問題在於研究者援用外來的理論與方法以了解本地的傳播現象，但卻可能掩蓋了或甚至扭曲了本地重要的傳播問題。因此，長期依附的結果可能造成研究者以及研究對象的「雙重異化」。換言之，學術工作者本應創造出適當的研究工具，但在依附的情境下，卻無法真正地完全掌控研究工具，況且，學術研究本應是基於本地社會；但是，本地社會卻可能淪為檢證西方理論的「實驗室」。因此，未來研究者似宜正視研究的主體性問題。

建立研究的主體性則包括兩部份（徐正光，1994：44-46；葉啓政，1994：73-78）。第一是研究者的主體性問題。也就是說，在知識論上，研究者必須反省應如何建構一個詮釋架構以了解傳播體系。研究者必須自我批判：自身所處的歷史與社會情境為何？這些因素又如何形塑個人

的問題意識、理論位置、方法論立場以及社會實踐的態度。第二是研究對象的主體性問題，也就是說，在本體論上，研究者必須深入思考：在歷史的過程中，台灣社會已發展出何種特殊的傳播文化？它的深層結構與文化邏輯為何？以上兩類研究主體性的建立，是在理論與個案不斷地對話與辯證的過程中達成。研究者必須尊重研究場域中獨特的歷史經驗與邏輯思維，修正本身知識論的立場，以捕捉台灣傳播文化的特質。



智慧藏

註釋

- (1) 筆者認為：造成台灣傳播學術依附的現象，主要的原因是外在政治經濟的依附。除了這個因素外，文化上的因素（如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或文化的運作（如國科會的評比上，國外期刊論文的點數較高）也可能有助於形構此依附關係。但是，這些文化因素與運作，又可能是受到長期對外政治與經濟上的依附之影響。因此，本文以政治經濟因素為論述重心。至於其他文化的因素的探討，則可能會在他文中進行深入的分析。



參考書目

-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1952）。《宣傳手冊》。台北：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
-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2）。《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台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
- 中國國民黨黨史工作委員會（1981）。《中國國民黨六十五工作記實》。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 中國國民黨黨史工作委員會（1980）。《中國國民黨六十六年工作記實》。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 王洪鈞（1993）。《我篤信新聞教育》。台北：正中。
- 石永貴（1969）。〈新聞學研究之回顧〉，《新聞學研究》，4：119-140。
- 包澹寧（1995）。《筆桿裡出民主》。台北：時報文化。
-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1956）。《鞏固台灣光復大陸加強總動員案草案（第二輯）》。台北：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
- 江冠明（1988）。〈媒體的反叛〉，《南方》，15：100-103。
- 改造出版社（1954）。《宣傳工作的策劃與實施》。台北：改造出版社。
- 朱立（1995）。〈傳播研究「中國化」的方向〉，臧國仁（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頁21-37。台北：政大傳播學院研究中心。
- 朱立（1978）。〈開闢中國傳播研究的第四戰場〉，《報學》，6（1）：20-27。
- 朱謙（1995）。〈中文傳播研究卅年回顧與前瞻〉，臧國仁（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頁11-17。台北：政大傳播學院研究中心。
- 朱謙（1964）。〈大眾傳播理論體系〉，《報學》，3（2）：24-26。
- 李瞻（1976）。〈我國中央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三大日報內容之統計分析〉，《新聞學研究》，17：1-25。
- 余夢燕（1953）。〈美國新聞教育家與中國〉，《報學》，1（5）：60-62。
- 林元輝主編（1995）。《一步一腳印》。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新聞所。
- 林芳玫（1998）。〈後現代理論與色情：真實與再現的危機〉，《傳播研究簡訊》，13：7-9。
- 林芳玫（1996）。《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

台北：巨流。

林東泰（1997）。《大眾傳播理論》。台北：師大書苑。

林靜伶（2000）。《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

林麗雲（2001）。〈傳播研究史：台灣傳播研究典範的峰迴路轉〉，「二十一世紀傳播學門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台北，政大傳播學院。

周安儀（1981）。《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下冊）》。台北：黎明文化。

南方望（1986）。〈知識份子死了一知識份子的理想與幻象〉，《南方》，3：10-13。

馬之驢（1986）。《新聞界三老兵》。台北：經世書局。

祝基濤（1986）。《我國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研究現況之分析》。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翁秀琪（1992）。《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

徐正光（1994）。〈戰後台灣社會研究主體性的發展〉，《台灣文藝》，141：40-46。

徐佳士（1984）。《大眾傳播理論》。台北：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徐佳士等（1978a）。〈台灣地區大眾傳播過程與民眾反應之研究〉，《新聞學研究》，20：1-21。

徐佳士等（1978b）。〈改進台灣地區大眾傳播國家之發展功能的研究〉，《新聞學研究》，21：1-41。

徐佳士等（1976）。〈台灣地區民眾接觸媒介的動機與滿足〉，《新聞學研究》，17：27-60。

孫秀蕙與林芳玫（1995）。《觀看電視：家庭生活情境、權力關係與消費行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研究案。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孫秀蕙與馮建三（1995）。《廣告文化—Advertising Culture》。台北：揚智文化。

陳玉璽（1992）。《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台北：人間。

陳世敏（2001）。〈華夏傳播學方法論初探〉，「中華傳播學會 2001 年年會暨論文發表會」論文。香港。

陳世敏（1983）。《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台北：三民。

陳世敏（1970）。〈報學半年刊的內容分析〉，《報學》，4（4）：45-49。

- 陳世敏與夏春祥（1998）。〈向文化轉〉，《傳播研究簡訊》，14：1-3。
- 陳雪雲（1997）。《歌迷文化與流行音樂》。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研究案。
台北：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
- 陳雪雲（1996）。《新聞媒體之消息來源研究：以報導犯罪新聞為例》。
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研究案。台北：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
- 陳雪雲（1982）。〈大眾傳播的理論基礎〉，《報學》，6（9）：63-66。
- 陳韜文（2000）。〈理論是本土研究與國際學術的紐帶〉，《傳播研究簡訊》，22：1-3。
- 張錦華（1994）。《媒介文化、意識型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台北：正中。
- 張錦華（1990）。〈傳播效果理論批判〉，《新聞學研究》，42：103-121。
- 張錦華（1987）。〈批評理論—賀爾的文化研究簡介〉，《新聞學研究》，39：91-116。
- 馮建三（1995）。《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唐山。
- 馮建三（1992）。《文化、賄賂、脫衣秀》。台北：時報文化。
- 馮建三與程宗明譯（1998）。《傳播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原書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Sage.)
- 曾虛白（1968）。〈十五年來的政大新聞研究所〉，《新聞學研究》，3：1-15。
- 曾虛白（1965）。〈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報學》，3（5）：58-64
- 曾虛白（1963）。〈華德·李普曼的理論與其實踐〉，《報學》，3（1）：2-8
- 曾澍基（1988）。〈大眾文化與反叛文化〉，《南方》，16：110-119。
- 傅大為（1991）。〈從「避秦」到「反依賴」—三十年台灣「人文社會科學」歷史片斷之反省〉，傅大為（著）《「知識與權力」的空間—對文化、學術、教育的基進反省》，頁 81-93。台北：桂冠。
- 程宗明（1999）。〈析論台灣傳播學研究/實務的生產（1949-1980）與未來：從政治經濟學取向思考對比典範的轉向〉，《1998 傳播論文選集》，頁 385-439。台北：中華傳播學會。
- 葉啓政（1994）。〈對社會研究「本土化」主張的解讀〉，《香港社會科學學報》，3：52-78。
- 楊國樞（1987）。〈緒論：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研究的台灣經驗〉，《三十年

- 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頁 3-31。台北：東大。
- 鄭瑞城（1995）。《「傳播學門現況與發展研討會」結案報告》。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劃。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 鄭瑞城（1987）。《傳播的獨白》。台北：久大文化。
- 鄭瑞城等（1993）。《解構廣電媒體》。台北：澄社。
- 潘家慶（1987）。《發展中的傳播媒介》。台北：帕米爾書店。
- 蕭新煌（1987）。〈三十年來台灣的社會學：歷史與結構的探討〉，賴澤涵（編），《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頁 329-390。台北：東大。
- 謝然之（1963a）。〈新聞學的發展與新聞教育之改革〉，《新聞學論叢》，頁 143-226。台北：改造出版社。
- 謝然之（1963b）。〈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報學》，3（2）：4-6。
- 鍾起惠（1996）。〈本土批判傳播研究論述回顧與前瞻〉，《傳播文化》，4：67-95。
- 鍾蔚文（1992）。《從媒介真實到主觀真實：看新聞，怎麼看？看到什麼？》。台北：正中。
- 瞿海源（1989）。〈知識份子的現代性與社會現代化〉，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編），《知識份子與台灣發展》，頁 115-142。台北：中國論壇雜誌社。
- Carey, J. (1997).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 S. Munson,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14-33).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ocherty, D. et al. (1993). Scholarship as sil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230-238.
- Gitlin, T. (1978).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6, 205-253.
- Gold, T.(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aiwan's miracle*. Armonk: M.E.Sharp.
- Hardt, H.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Krippendorff, K. (1993). The past of communication's hoped-for fu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34-44.

-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ttlejohn, S. W. (1999).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6th ed). London: 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
- Lowery, S., & DeFleur, M. L. (1983).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dia effects*. New York: Longman.
- Melody, W. H., & Mansell, R. E. (1983). The debate over critical vs.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Circularity or challen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103-116.
- Robinson, G. J. (1988). "Here Be Dragons:" problems in charting the US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10, 97-119.
- Rogers, E.M. (1994).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N.Y. :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 Schramm, W. (1980).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4, 73-82.
- Simpson, C. (1994). *Science of coerc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lack, J. D., & Allor, M. (1983). The polit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constituents of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208-218.
- Smythe, D. W., & Dinh, T. V. (1983). On cr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A new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117-127.

Dependent Development ?

The Paradigm Shifts in Taiw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ihyun Lin*

Abstrac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aiw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s. This paper aims to draw a historiography of the fiel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proposed in this paper postulates that, under the given circumstances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while adjusting themselves to the local contexts, Taiwan's communication studies mainly follow its US counterpar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aiwan has therefore undergone paradigm shifts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ideal-typ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exploring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field.

Keyword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istory, paradigm, academic history,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ihyun Li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sinchuan, Taiwan.